

“村房”刻画华西发展“年轮” “脏乱差”下姜蝶变“绿富美”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一景（3月13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李博摄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朱国亮）错落有致的欧式别墅、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现代时尚的文体活动中心……漫步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最引人注目的是房子。

“同样是6口人，我家现在的住房面积是上世纪60年代的40倍。”华西村民赵志秋去年又向村里购买了一套650平方米的别墅，家中住房面积增加到约1200平方米。

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率先富起来的村庄代表，也是坚持集体经济模式、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过去几十年，华西村在发展中赢得太多“第一”。但在赵志秋和村民的眼里，住房、楼宇的更新迭代凸显着村庄发展的真实“年轮”。

1961年建村时，华西是江阴有名的穷村，地少人多。赵志秋兄妹4人和父母挤在一个约3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从1965年开始，直到1973年，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华西村民陆续住进了第一代公寓平房，大队下辖的12个自然村落实现了集中居住，彻底告别了土坯房、茅草房。

至今，华西村还保留了三间这样的平房供游客参观，青瓦白墙，窗户不大，房屋不高，一户两间，一字排开。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住房不免过于简陋。

时间推移到改革开放。1980年，赵

志秋结婚。1982年，这个三口之家住上了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第一代公寓房——“火车楼”，楼上一间，楼下两间，共约120平方米。

所谓“火车楼”，类似城里的“筒子楼”，二层高，长长的一排，像一列火车似的。由此，华西人住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

1988年，华西率先成为江苏第一个“亿元村”。村民对住房也有了更高的期盼，别墅开始纳入村庄建设范畴。

又一个10年过去，时间到了上世纪末，约350栋高3层、每层3间的别墅陆续建成。全部村民住房再次升级，华西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别墅村”。

而今，赵志秋和村民们住的是2000年后村里建设的第二代带花园或游泳池的欧式别墅，面积500多平方米。去年，他又向村里买了一套更大的别墅，加地下室共约650平方米。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仿佛做梦一般！”赵志秋夫妇现在和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住在一起，还是6口人，住房面积却是过去的40倍，这让他感慨不已。

华西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华西村民人均年收入约220元，2017年已超过9万元，是1978年的400多倍。

华西不仅住房快速更新迭代，村庄楼宇建设也是不断升级。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华西就盖起了一栋4层大楼，作为村办学校。1996年后，华西又相继盖起10座10多层的塔形大楼，其中1996年落成的金塔为15层。

进入新世纪，因土地资源紧张，华西投资30多亿元，建起了74层、高328米的龙希大楼，内设星级酒店。它为华西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成为华西标志性建筑。

如今，华西的建筑更讲究设计感和现代感。2016年落成的、投资2亿多元的华西文体活动中心就是这样一栋建筑。它外形如同打开的一本书，一边是村民开会的大会堂，可容纳2500人；一边是村民娱乐健身中心，国际影院、健身房、棋牌室、室内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桌等一应俱全。

大楼在华西相继拔地而起，可华西村党委、村委的办公场所却还设在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4层村办学校老楼里。

“村里学校早已搬迁重建，这栋楼就空置下来。10多年前，开始用作村党委和村委办公场所。”赵志秋说，“直到前年，这地还是水泥地，去年才粉刷了一下，铺上了瓷砖。”

赵志秋从村办企业退下来后，又被村民推选为村委副主任。现在，他就是在在这栋老楼里办公。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说，“发展为民”的思想一贯贯穿于华西发展的整个历程。这40年，华西顺应改革开放浪潮，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规则，为村庄发展赢得先机；同时，华西始终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让全体村民共享发展成果。

对华西的未来，赵志秋信心满满：“华西35岁以下年轻人基本都有大学学历，许多人还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正成为村庄建设主力军，我们的村庄建设会越来越美好。”



▲夜色中的下姜村（2017年8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保护环境：绿水青山带“笑颜”

初冬时节，从淳安县城出发，驱车沿千岛湖西南行。到达下姜村，但见远山含黛、溪水潺潺，石板路一尘不染，一栋栋白墙黛瓦的小楼参差错落，恍若世外桃源。

由于交通不便，人均耕地少，下姜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十足的穷山沟。村民迫于生计，家家户户养猪，村里露天厕所、猪圈、羊圈遍布，污水横流，臭气熏天。

烧炭也是当时村民的一大经济来源。老村党支部书记姜银祥回忆，那时候，下姜村有40多个木炭窑，不到5年时间，山上的树就被砍得所剩无几，四周群山像“秃山头”。

2003年，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村里开始了沼气项目建设。沼气池的建设和使用，成为下姜村美丽乡村建设的突破口。没人乱砍滥伐了，村两委顺势实行对近万亩山林封山育林。同时，村里建起了公共厕所，用上了自来水，建起了垃圾处理站和污水管，85%的农户装上了太阳能热水器，环境卫生得到根本好转。

2011年，各家饲养的猪也从“单身宿舍”搬入了村外的“集体宿舍”进行规模化饲养，下姜村变得和城里一样干净。

因地制宜：顺“市”而为促发展

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怎么“拔穷根”？以良好生态发展旅游产业，适应市场需

求发展规模农业，吸引人才发展文创产业——在党员的带头示范下，下姜村迈出发展振兴的脚步。

2011年起，借助中国美院团队支持，下姜村打造景点式村庄，布局了35个美丽乡村精品建设项目，大力发展民宿产业。目前，全村拥有民宿27家，床位500余个，今年1至10月，实现产值2585万元。

60岁的村民姜海根将自住的楼房改建成了民宿，并提供餐饮、夜宵等服务，年收入达30多万元。“现在的日子以前真是想都不敢想。”姜老很开怀。

下姜村一度以蚕桑叶、茶叶、中药、毛竹“四张叶子”为抓手发展农业，经济收入曾占农民收入的一半，后来，逐渐转向更高附加值的规模农业和设施农业。

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说，村里成功流转土地430亩，建成了葡萄园、草莓园、茶叶园、中药材园等几大产业园区，村民收入实现“节节高”。

为避免乡村旅游同质化竞争，下姜村打出“人才牌”和“文创牌”。走进“农民画家”陈苏兰的创意小店，趣味横生的石头画令人耳目一新。陈苏兰说：“这些鹅卵石都是在下姜村就地取材，大的石头画可以卖几百元，客人下单后直接快递送到家。”

除了服务好各类返乡创业的人才，下姜村还充分发挥传统技艺价值，鼓励

模范带头：致力于乡村振兴

记者采访了解，在下姜村转型发展的紧要关头，党员干部发挥了关键作用。

除了全村第一个建沼气池，2011年，老党员姜祖海又带头建起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姜祖海说：“农家乐前期投入少也要十几万元，村民怕亏本有顾虑。我是党员，当然要带头干。”

村里推动规模化种植经济果木时，也是靠党员带头，顺利实现了土地流转。

在下姜村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一个都不能掉队”。村民老汪患有尿毒症，想经营民宿却苦于从银行贷款不到款。村两委干部知道后，主动帮他担保，从信用社贷款20余万元。如今，老汪依靠民宿年收入就超过了5万元。

村里还组建了3个便民服务队，建立5个网格信息组，进一步精细村庄管理。此外，还深入开展党员亮家、亮承诺，党员“随手扫”“给孤寡老人当一天保姆”等活动，深受村民好评。

“党员干部就是要争做发展带头人、新风示范人、和谐引领人、群众贴心人，把下姜村建设好，发展好。”姜银祥说。

“农民城”龙港正圆“都市梦” “灼热的沙包”变身“果盘子”



▲空中俯瞰龙港大桥（12月3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新华社杭州12月3日电（记者谢云挺）在温州南部鳌江流域入海口，曾以传奇般农民自费造城之誉名扬海内外的苍南县龙港镇，如今已成为37万常住人口的工业大镇、经济重镇。目前正向现代化新生城市跨越。

近日，记者走访龙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苍南县龙港镇党委书记陈为来说，自1983年建镇以来，龙港经历了“小渔村到农民城、农民城到产业城、产业城向现代化新生城市迈进”三个发展阶段。这35年的每一步都烙刻着改革的印记。

龙港建镇之初，只是几个灯不明、路不平的小渔村，总人口8000余人。放眼望去，除了一片矮屋就是荒滩。为了吸引农民进城和筹集城镇建设资金，龙港在全国率先推出土地有偿使用和户籍制度改革，掀起了农民造城旋风。

今年80岁的第一任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回忆说，当时，镇会议室里悬挂的巨幅“龙港规划图”前，天天人挤人、肩擦肩。高峰时的1985年，全镇3000多间楼房同时兴建，来自各地参加造城的有37支建筑工程队，4000多个木工、泥水匠，3000多个杂工，加上建房主人，每天上工地的就有1万多人。

这座不用国家投资，完全依靠农民自身力量建设起来的新城，被誉为“中国第

一座农民城”“中国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

记者了解到，1994年，龙港镇的综合经济实力已跃居温州全市乡镇第一。然而，逐渐“长大成人”的龙港，“小马拉大车、大脚穿小鞋”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日益凸显。从1995年开始，龙港镇被国家有关部委确定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后，寻求“镇改市”的突破努力，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建农民城到构建现代新型城市管理架构，我们期待，龙港再次在中国城乡发展史上写下浓重一笔。”陈定模说。

2014年底，龙港作为全国首批仅有的两个镇级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之一，在国家有关部委和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探索特大镇的新型设市模式，目前已取得明显的实践成效。

据了解，按照试点的目标要求，龙港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新”字：一是新在大部制。组建了党政机构合一的15个大部制机构，有效承接1575项县级权限事项。实现了机构精简、效率提升。二是新在扁平化。实行市管村（居）、分片服务新模式，减少管理层级，改变了传统县级政府下辖乡镇（街道）再到村（居）模式。三是新在平台建设。实行了集中审批服务和综合行政执法。按照“最多跑一次”要求，龙港以大部制为依托，以网格管理为手段，以



信息技术为支撑，构建了“四个平台”，形成了全新的社会综治管理模式。

龙港镇镇长陈显宏说，2016年底，龙港获批承担新型城镇化标准化国家试点。“近日，龙港以优秀分值通过了国家标准委组织验收。这意味着，龙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行政改革领域走出了一条标准化的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子。”

“龙港因改革而生，伴改革而长。”陈为来说，如今的龙港，生产总值已达277.1亿元，经济总量比建镇初期增长了5500多倍，区划面积从7.2平方公里扩大到183.99平方公里。2018年，综合实力列全国百强镇第17位。

记者采访了解到，全国首个镇级地下人防商业街、温州首个镇级体育馆等一批重大项目已经建成投用，而且拥有广阔的拓展空间，为龙港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刚刚建成通车的鳌江四桥，使得龙港跨越鳌江与对岸平阳鳌江镇共建的五座大桥，已有三座建成通车，到2019年将全部实现通车，构建起龙港与外界紧密联系的大交通格局。

诚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道德说，近年来，众多县级权限事项下放给龙港镇后，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便利。龙港通过精简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短办事时限，营商环境明显改善。“龙港的建市梦可期，必将极大促进经济能量的集聚，并且为温州南部副中心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龙港试点培育现代化新生城市，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生动实践。温州市委党校教授朱康说，龙港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为破解全国新型城镇化的共性问题，突破特大镇创新发展桎梏，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推广可借鉴的模式。



▲拜什托拉克克乡伊斯勒克墩村村民将晾晒好的红枣装箱（11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关倩倩摄

显示。“当大家见到红枣的经济价值以后有了对比，开始不断引进树苗发展种植。”史鹤山说。

73岁的伊斯勒克墩村村民阿布都克里木·萨德尔跟着富起来了。“我们跟着他们学技术，怎么管理，如何施肥、浇水。”阿布都克里木·萨德尔说，如今除了自己的40亩红枣外，儿子还承包了600亩红枣，每年成批量销往内地，挣得钵满盆满。

阿依加玛力·达吾提介绍，目前全乡的红枣种植面积已发展到29000亩，灰枣亩产达到800公斤，骏枣达到500公斤。而伊斯勒克墩村因为农业生产转型快，早在2013年，全村人均纯收入高达20余万元，是新疆深度贫困地区里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在拜什托拉克克乡和融新村村民艾力·吾吉艾合麦提眼里，当地最大的特点是“互帮互助”。“少数民族群众学种植技术，种红枣、西红柿、辣椒，汉族群众给我们讲怎么管理，怎么打药，怎么上肥。”2015年外出打工的艾力·吾吉艾合麦提回到家乡种植大棚。“头一年种一个大棚的收获卖不到2000元，现在学会了管理，一个棚的收获能卖七八千元。”

“一家一户富裕不算富，大家都富裕了才算富。”史鹤山说，尽管不少乡村效仿种植红枣，但技术不过关、产量上不去，为此，当地政府牵头由伊斯勒克墩村与全乡其他11个村结对认亲，在生产生活上帮助帮扶。

伊斯勒克墩村村民李胜武和他的“亲戚”依提帕克吾斯唐村村民巴尔塔洪·托乎提明结婚3年。“从种到收手把手地教，3年枣树增产一吨多，相当于增加了两万元的收入。”巴尔塔洪·托乎提明说，除了枣树管理外，种小麦、发展养殖也都是李胜武帮忙扶持起来的。

“地里有活儿了都是相互帮忙，巴尔塔洪·托乎提明一家也会在红枣丰收的时候来我家帮忙。”李胜武说。

多年以来，当地的互帮互助已经形成了传统。一些维吾尔族农民既挣了钱又学到了红枣种植技术和农机使用技术，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当地红枣种植专家。

如今，拜什托拉克克乡以发展红枣产业为支撑，团结互助谋发展，在伊斯勒克墩村的带动下，周围邻村的红枣产值由每亩2000元上升到8000元，居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